

二十世纪最大的政治之谜

希特勒的阴谋

国会纵火案内幕

44

工人出版社

《希特勒的阴谋》

——国会纵火案内幕

原著〔日〕桧山良昭 王泰平译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工人出版社北京市发行部发行

628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85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统一书号 11007·22 定价 1.30 元

原版前言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夜，德国国会大厦被人纵火焚烧了。这个案件发生于希特勒政权诞生后约一个月、大选前一个星期、选举战正酣的时候。

希特勒政府宣布这个纵火案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有计划的行动，对共产党活动家和反希特勒政权的政治家进行了大逮捕。进而，乘势一举建立了纳粹的独裁体制。

这个案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勿须赘言的。

其结果是，诞生不久的希特勒政权镇压了反对势力，加强了独裁体制，迅速走上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因此，西欧的现代史学家把这个案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那么，这样一个巨案是谁又是怎样策划的呢？

在熊熊燃烧的国会大厦里被逮捕的是一个二十四岁的荷兰青年工人范·德·卢贝，他曾是荷兰共产党党员。作为同案犯被逮捕的还有德国共产党议员团长恩斯特·托格勒和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可是，法庭的审判不能证明此案是卢贝和另外四个人的共谋案，结果，除卢贝之外，其余被告都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了。

唯一能够说出真相的卢贝却一直缄默不语，直到被处死，也只字未吐。

纳粹虽然宣布在纵火案的背后有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可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却反驳说，纵火案是纳粹为镇压共产党而制造的阴谋。

在战后的西德，弗利兹·托比亚斯进而提出了卢贝单独犯罪的主张，使疑团更加难释。

真相究竟如何呢？

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推理将这个被人们称之为“二十世纪最大政治之谜”的案件写成本书的。

一九七九年九月，我访问柏林，得到了从旧国王广场一睹国会大厦这座古式建筑的机会。现在广场已更名为共和国广场。时值晚上九点钟。约半个世纪以前的此时此刻，犯人范·德·卢贝“侵入”了国会大厦。

几分钟后，国会食堂里吐出了火舌，几个小时之后，发生了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巨案。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九时。为纵火而‘侵入’国会的，是卢贝一个人呢，还是有同谋？”我一边在人影稀疏的共和国广场上踱着步，一边向矗立在夜空下的国会大厦发问。

那时，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时间又滑回了纵火案发生的夜晚，预感到马上就会从眼前的国会大厦里喷出火来。我赶忙穿过草地，走近国会大厦的西南角。当时，在东面老远的地方，将东西两个德国隔开的“柏林墙”映入了眼帘。

“柏林墙”是从国会大厦的东侧横穿过去的。

一刹时，我又回到现实中来了。原来我所在的并不是希特勒政权下的德国，而是半个世纪之后被分割成东西两部分的德国。

在这半个世纪中间，关于国会纵火案，有许多新的事实片断显露于世，又从各种角度作了尽可能的探索和最大限度的调查。

即便如此，这个案件也许象许多不了了之的政治事件一

样，大概不会有真相毕露之日了。不能确证之处，只有依靠推理了。

关于这个案件的结果，一个被迫流亡的剧作家、列宁奖金获得者贝尔特鲁特·布列锡，曾经构思过一部作品，但未及动笔就去世了。

借用他的构思虽也是一件有兴味的事，但我并不具有布列锡那样的才能，而且，同布列锡进行那种构思的时代（战前）相比，许多事实已经水落石出。为此，我用我自己的构思写了这部作品。

这个作品分三部。

第一部写的是从起火到侦查总部逮捕犯人的过程，主要是从侦查总部的角度写的。

第二部从被告之一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角度描述在国会纵火案审判过程中弄清的事实。

第三部论述该案发生后出现的咄咄怪事和案件的真相，其中夹杂着笔者的一些推理。

一九七九年八月，唯一被处决的犯人范·德·卢贝的荷兰遗族向柏林地方法院提出重新审理该案的请求。

据说现在，柏林地方法院正在研究是否该重新审理。

在西德，现代史学家和记者依然分成两派。一派认为纵火案的黑后台就是纳粹；另一派则认为是卢贝一人的犯罪行为。双方正在电视和杂志上进行激烈争论。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要看看柏林地方法院作何种决定。

当我写完这本书时，又一次感到这种政治阴谋的可怕。

纳粹谋划了这个纵火案，并付诸实行，却把它嫁祸于共产党，弄虚作假，制造冤案，销毁证据，谋杀了直接、间接了解真相的人。

是一小撮当权者的野心和暴行，给众多的人带来了牺牲。

同样的案件，在这以前曾有过，在这以后也发生过。我想大概将来也不会绝迹吧。

桧山良昭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九日

目 录

第一部 纵火案

- 第一章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 第二章 发现火警
- 第三章 政府的反应
- 第四章 侦查
- 第五章 大选和授权法
- 第六章 卢贝的政治背景
- 第七章 季米特洛夫被捕

第二部 季米特洛夫的推理

- 第一章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 第二章 起诉书
- 第三章 审判
- 第四章 证据审理
- 第五章 专门委员会的证言
- 第六章 亨尼斯多夫的伙伴
- 第七章 与戈林的交锋
- 第八章 弗朗兹·瓦钦斯基

第三部 真相何在

- 第一章 消灭活证人
 - 第二章 开始追究案件真相
 - 第三章 六月三十日事件
-

第四章	“单独犯罪”的主张出现
第五章	案发时的国会议长官邸
第六章	瓦钦斯基是何许人
第七章	纵火计划
第八章	真正的纵火犯是谁
第九章	阴谋的策划者
后 记	

“群众都会撒谎。然而，他们只会撒小谎。因此，他们互相提防着不要被小谎所骗。

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自己羞于启齿的大谎。伟大的政治家看准的正是这一点。”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第一部 纵火案

第一章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对地处柏林市西北郊的亨尼斯多夫居民来说，这一天照样是从忧郁的早晨开始的。那里的居民大多是工人，自一九三〇年以来，他们处于失业状态，早晨一扔下饭碗，就得象往常一样，到区福利局去找营生。然而，福利局介绍的差不多全是扫马路、扫雪之类的日工，到工厂当个长期工人的希望几乎是没有的。

一九三〇年以前，这个地区充满了生气。附近有 AEG（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电机厂，居民们靠那家厂里的工人们撒下的钱过日子。从一九二五年起，薪水年年增加，劳动条件年年改善，工人们对未来并不担心。他们几乎全都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下属的自由工会，其政治思想是稳健的。

每天一下班，他们便转到小酒馆里喝上一杯，扯扯政治，或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阵子，藉以松快一下自己。

一九二九年秋天，德国西部的煤炭、钢铁企业缩短开工时间、失业者增加的消息传到了这里。

“咱们公司可与它们不一样。因为咱们厂子经营的好”。

他们凑到一块儿时，都这么谈论着。事实上，德国的煤炭钢铁业确与德国的电机厂商不同，前者正在同英国的煤炭、钢铁业的竞争中苦战，而后者则在国际竞争中操了胜券。

可是，在一九二九年秋天，大家终于明白，原来人们所说的暂时性的经济衰退，只不过是半年后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先兆。在亨尼斯多夫，失业率从百分之十上升到百分之十五，又升到百分之三十，而且，终于超过了百分之四十。

繁荣的产业工人的街镇，刚出三年，就化为荒凉的贫民窟了。自杀者不断出现，流浪汉充斥街头，人们到了这样的地步：或者有气无力地沉沦下去，或者采取过激的政治行动。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成立的希特勒内阁向失业工人许诺实行振兴就业政策。可是，一个月过去了。失业者的得救谈何容易！

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大会上，因满洲国问题，各国都谴责了日本。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出马竞选下届总统，竞选活动以三月四日的投票日为目标，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比希特勒政权晚一天成立的法国达拉第内阁，因妇女团体要求妇女参加政权，正在受到激烈的攻击。

对亨尼斯多夫的居民说来，世界上的这些事件都是无所谓的。燃眉之急是填饱当天的肚子；其次，关心的是在三月五日的国会选举中投哪个党的票。

国会已于二月四日解散，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投票日子了。

那天清晨，范·德·卢贝被瓦钦斯基喊起来了。

“起来！已经七点了！”

范·德·卢贝睁开眼，出现在面前的是马面似的瓦钦斯基的大长脸。瓦钦斯基在西装上套着一件黑大衣，戴着帽子，右手提着一个褐色小皮箱。

卢贝慢悠悠地爬起来，下床时把床弄得嘎吱嘎吱直响。他穿着衬衣在窄巴巴的洗脸间里洗脸，再用手指蘸着水蹭蹭牙，顿觉清爽了一些。

“毛巾借我用一下。”

卢贝朝瓦钦斯基喊了一声。瓦钦斯基从脚边的旧皮箱里拿出毛巾，走到洗脸间，递给了他。

卢贝用毛巾拭着脸，身上哆嗦起来。他听到了马车走过外面的石头大街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电车的声音。不知什么地方一直开着的收音机里，还传出了科妮·瓦尔德的歌声。科妮是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女歌星。

卢贝一走出洗脸间就赶紧整装。他穿上衬衫，系上领带，套上西装背心，又穿上裤子、夹克，再在上面套上一件大衣，最后戴上一顶鸭舌帽。

瓦钦斯基看到卢贝衣服那股脏样儿，皱起了眉头。他额头上刻上了几道皱纹，一下子显得老了许多。

“你不刮刮胡子吗？”

“没有刮胡刀。”

“还是刮一下好，因为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瓦钦斯基从箱子里摸出刮胡刀，递给了卢贝。

他俩呆的地方是亨尼斯多夫的简易免费旅馆。这是一座由警察管理的旅馆，收容着无处过夜的流浪汉。这个简陋的建筑物在警察署的后面。虽说没有暖气设备，四处透风，总比露宿街头冻死好些。

每个房间里都有洗脸间和淋浴设备。双层床象养蚕架似的靠左右两面墙放着，可以住进四个人。但是，这天夜里，住宿的只有卢贝和瓦钦斯基两人。

卢贝刮完胡子，手里拿着刮胡刀和毛巾走出洗脸间时，瓦钦斯基对他说：“喂，咱们走吧。没落下什么东西吧？”

瓦钦斯基从卢贝手里接过毛巾和刮胡刀，收进箱子，咔嚓一声打开门锁，右手拎起了箱子。然后，环视了一下房间里，看看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

两人走出房间，来到了散发着公共厕所臭气的过道。他们顺着光秃秃的水泥地，朝大门口走去。

卢贝空着手走着。

旅馆的入口处有个门房，一个上了年纪的警察以挑剔的目光瞅着周围的一切。这是署长手下唯一的警察，他的名字叫施密特。

瓦钦斯基大大咧咧地走到他跟前。

“要出去吗？”

施密特粗声粗气地问他。

“当然。但是，我想这同你没有什么关系吧？”

瓦钦斯基用挑战的眼光看着施密特。

“你叫什么名子？”

施密特一边瞪着瓦钦斯基，一边用履行公事的口吻问道。

“瓦钦斯基。弗朗兹·瓦钦斯基。”

帽沿压得低低的瓦钦斯基虽然声音很低沉，但发音却很清晰。

施密特往住宿名册上填写上“Frana Watschinski”，又仰起头看看头上的挂钟，在名字的后头，又写上了离馆的

时间：“七点四十五分”。

接着，他又把眼睛对着躲在膀大腰粗的瓦钦斯基身后的卢贝，用下巴指着他问道：“那个叫什么名字？”

“玛丽努斯·范·德·卢贝。”

卢贝从瓦钦斯基的背后探出头来答道。于是，施密特在名册上写上“Marinus van der Lubbe”，下面也填上了“七点四十五分”几个字。

“喂，走吧！你们可不要在这一带惹麻烦啊。”

施密特合上住宿者名册后，就用粗暴的口吻这样对他俩说，并在他们眼前直挥手，象赶苍蝇似的要把他俩撵走。瓦钦斯基和卢贝面无表情地离开了他，朝门口走去。

施密特早就把这两个流浪汉忘得一干二净了。

亨尼斯多夫一带是工人集居的地方。一九二九年末的经济危机以来，处处皆是失业者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瓦钦斯基和卢贝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他俩是初次相见，都是前一天傍晚独自来到这里的。今天他俩一块儿出门，必定是因为昨晚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谈得投机，交上朋友了。

这两个人和在这一带常见到的流浪汉并无二致。他们同类每天有几十个人进出这个旅馆。仅昨天晚上，就有三十几个流浪汉住在这家旅馆里。

弗朗兹·瓦钦斯基和范·德·卢贝穿过旅馆前面的大街，走进了对面的简易食堂。因流浪汉太多，那里只赐给每个人一杯咖啡。为了得到这一杯咖啡，四、五个流浪汉排在那里，冻得直跺脚。

咖啡味道虽淡，下肚后身上可暖和了许多。

“喂，该吃饭了。我认识一个人在这附近，咱们去吧！”

瓦钦斯基把杯子放到桌子上，催促着卢贝。

外面雾雨濛濛。瓦钦斯基和卢贝竖起大衣领子，向南面走了一百米左右。

瓦钦斯基离开马路，走进了一条胡同。他在一幢房子前停了下来。

“你在这儿等一下，我把朋友领来。”瓦钦斯基话音刚落，就消失在一幢古老的红砖建筑中了。

不一会儿，瓦钦斯基带着一男一女出来了。

“他俩都是共产党。决定跟我们一块干。”瓦钦斯基这样告诉卢贝，但并未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子。

“这个人也参加吗？”女人不安地问瓦钦斯基。

“没问题，这小子信得过。”

“叫什么名字？”

“卢贝。玛丽努斯·范·德·卢贝。”

“不是德国人吧？”

“对。是从荷兰的莱登来的。”卢贝天真地答道。

“不要多管闲事。彼此间什么也不知道为好。省得被捕后，别人受牵连。”瓦钦斯基提醒女人注意。

“那末，我们什么时候动手？”那个男人问瓦钦斯基。

“今天晚上。详细计划回头再告诉你们。先吃饭吧！”

女人相约说：“我的小叔子和他的朋友就在附近。去那里边吃饭边谈吧。”

“他们也是党员吗？”瓦钦斯基问。

“两人都是。”

女人讲的这两个人在“格拉菲理发店”的二楼租了一间屋子住着。

四个人从刚开门的理发店大门旁上了楼。

前头的女人敲敲发黑了的门，一个枯瘦的、两只眼睛炯炯发光的青年男人探出头来。

“是我。我领着朋友来了。让我们进去。”

房间又窄又暗，冷冰冰的。靠墙放着单人床。一条毯子堆在脚边。房间当中的木桌看样子既是饭桌又是书桌，上面乱七八糟地放着脏污的餐具和一些书。

男人们随意坐在椅子和床上。女人把桌上的餐具收拾进厨房里，开始做饭。

“巴尔奇怎么样啦？”跟女人一块儿来的那个男人问她的小叔子。

“还在找工作。我把他叫来吧？”他一说完，就走出了房间。不大工夫，就领着一个矮胖的、脸色难看的年轻人进来了。

“哎呀，巴尔奇，你怎么闷闷不乐的样子啊？”

那个女人的同伴说了一声。

人称巴尔奇的这个小伙子，挪开毯子，坐到床上。

“今天，到底是个什么聚会呀？”巴尔奇扫视一下瓦钦斯基和卢贝，问道。

“三月五日的选举，我们完全不是纳粹的敌手。如果我们现在不奋起，以后就得被纳粹整垮。现在大家正在谈这件事哪！”瓦钦斯基把身子转了个方向，对巴尔奇作了说明。

“我也这样认为。这样下去，就要重蹈意大利的覆辙。”

“如果有人发难，你们也能起而响应吗？”瓦钦斯基有力地说。

那个女人的同伴说：“当然要干！党现在太老实了，大家都很有着急。如果某人点一把火，整个火药库就会来个大爆

炸。”

瓦钦斯基用下巴指了指卢贝，说：“那个‘某人’就是他。今天晚上他要动手。如果他干了，大家跟上来就行了。”

卢贝洋洋得意地环视了一下大家。

“哎。饭做好了。吃完饭再谈吧。”

女人把饭菜端上了桌子。

范·德·卢贝一九〇九年一月十三日生于荷兰莱登市的一个贫民窟。父亲叫弗朗西斯科·柯尼留斯·范·德·卢贝，是个生意人。

这位父亲四十一岁时，同有四个孩子的寡妇密特罗尼拉·范·汉琪·波蒂结婚，又生下让、柯尼留斯和玛丽努斯三个孩子。

一家九口人挤住在贫民窟的狭窄公寓里。弗朗西斯科·柯尼留斯是个好吃懒做的人，每天打从早晨起，就泡进酒缸里。玛丽努斯四岁那年，他离家出走，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被遗弃了的密特罗尼拉拖着七个孩子，在家跟前开了个小杂货铺，总算能够糊口。

第一次大战前，在欧洲的贫民窟里，象密特罗尼拉那种处境的女性，要么扔下孩子出走，要么当妓女养活孩子，除此之外，别无生路。密特罗尼拉没走其中的任何一条路就混过来了，真算不错了。

但是，她家穷到何等地步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密特罗尼拉不辍劳作，积劳成疾，一九二一年卢贝十二岁时，她生了一场病就死了。

成了孤儿的卢贝被已经出嫁的异父姊安妮·夏珍领回家，一边象仆人似的干活，一边上学念书。一年半之后，他在姐夫的劝说下，拜木匠为师，白天干活，晚上去夜校学

习。

卢贝十六岁时，已经学就了一身好手艺，在同辈人中，他挣的钱算多的了。他个子虽不高，却筋肉结实，劲儿比同龄的工友们都大。他的头脑说不上出类拔萃，可也不坏，是个腼腆、温和的少年。

卢贝的身世与阿道夫·希特勒一模一样。两人都有异父兄弟；都有个嗜酒成性、象暴君一般的父亲；又都是早年丧父，接着是失去母亲，不得不凭自己的力量应付人世间的狂涛。

两人都是羞怯的，感情细腻，喜欢空想。而且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

一九二六年，卢贝十八岁时，经朋友劝说，加入了荷兰共产党、荷共的下属组织“德·扎伊尔”。所谓德·扎伊尔意为“革命的播种者”，是荷兰共产党最富于战斗性的青年团体。

荷兰共产党虽加入了共产国际，但采取较为稳健的路线。它得不到有组织的工人的支持，一直是一个小政党。

不多时日，卢贝竟当了党的地区主席，显露出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本领。他一有空暇，便跑图书馆，胡乱地读书。除了解析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书籍之外，他还喜欢伟人传记和非虚构的冒险故事。当时的卢贝，可以说是个对社会怀抱极度不满、憧憬着成功和冒险的平平凡凡的青年。

一年之后，一个打乱卢贝生涯的事件发生了。他同朋友一块儿游戏时，伤了两只眼睛。他虽幸免于失明，但视力衰退，不得不放弃参加技工考试的念头。

出院后的卢贝，同以前相比，判若两人。他换过多次职业，一攒点钱就去国外旅行。一九二八年去比利时和德国，一